

# 征路漫笔

——序《壮丽史诗·长征画传三部曲》

□沈尧伊

1990年春,为给连环画《地球的红飘带》后半部分创作收集素材,我第四次踏上了长征路。此行纵贯四川,南起彝海,北至甘南。长征中彝海结盟、飞夺泸定、翻雪山、过草地、攻占腊子口等最壮烈的一幕幕,都发生在这条路线上。

灯光下,我在画一只船。窗外,随风传来大渡河的海声。几个老汉围着我,兴致很高地指点、回忆,还不时地争论。安顺场是大渡河七场(集市)之最,渡口繁忙。后来随着公路大桥的修建,渡口荒废,渡船便成了文物。我看着速写本上根据老汉回忆而画的船,啊,它可真美!船头高昂,犹如龙舟,当年红军就是乘此船打过渡河的。它的独特形状是大渡河的汹涌急流造就的,正因为适应了自然规律,才产生了具有个性的造型美。若没有这些可敬的老汉,我怎么能想象出来呢?

乘一叶小舟,荡过大渡河,在北岸安顺场码头登陆。极目望去,巍巍山势,滔滔银河依然存留了它雄伟的气魄。从云雾缭绕的马鞍山,一条小路直插安顺场渡口,这是北渡的门户。1863年、1935年,石达开的太平军和中国工农红军都是三万大军,同在5月份,沿同一路线,全赶上大渡河汛期河水暴涨,都处在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险境,面临着生死之抉择。历史是何等惊人地相似!然而,“翼王悲剧地,红军胜利场”(陆定一语),结局又是那么截然不同。结局属于历史,而偶然性中包含的必然性则给后人留下不尽的思索。

看,位于安顺场西南的高寨,就是松林河上游磨房沟,通向泸定铁索桥之关口。在这里,彝族土司王应元据险夹攻,断绝了翼王石达开的最后一线生机。而在这里,红军未失一兵一卒顺利地通过,奔袭泸定,这是红军执行正确的民族政策的结果。红军战士的不畏艰险、勇敢和自我牺牲精神,是红军战略战术最重要的基础。沿着大渡河北上泸定,西岸皆峭壁,根本无路可行,全程共340里。当年王开湘、杨成武率领的红四团仅用了两天一夜,这种高速行军在平坦大道上尚且难以达到,何况从安顺场的磨房沟到转向泸定的磨西面,全是山间崎岖险路,还在路上打了两位,不时要修路搭桥,在倾盆大雨中边行军、边吃饭、边动员。这是何等令人难以置信的人间奇迹!正因为如此,红军的战略战术是世上任何其他军队所无法学会的。

## 二

碉堡,又是碉,又是楼。但不是军队的碉堡,而是碉堡化的民房。旧社会在大渡河一带,碉楼是中层上层百姓最普遍的住房。安顺场现存的碉楼中最高有四层,卵石为壁,留孔为窗,外小内大,完全是标准的机枪孔,向外望去,瑰丽之田园美景只一隙。川西北的藏、羌族旧民房虽不称碉楼,但形象更似堡。一楼关牲畜,二楼住人,三楼经营,高台石筑,关起门全部家产都得到保护。寺院官寨就更甚。我爬上黑水芦花山坡去参观当地过去最雄伟的建筑,那是一座废弃了的土司官寨(衙门),四层,四合天井结构,占地面积估计不下千余平方米。因为部分已倒塌,我只在外面转了一圈,发现门只有一个,而且非常小。我纳闷:怎么没有官府衙门那气派的大门呢?当地人解释说这是为了安全,内可屯兵屯粮,门小不易攻破。看来严酷的现实使藏民对“气派”的观念也和汉族不同了。小金川、马尔康地区的村口或险要位置常可见到残存的烽火台,石砌,有枪眼,高达四五十米,开始我还以为是工厂的大烟囱呢!马尔康之脚木足乡就有四座,呈菱形占据全村最重要的军事位置。旧中国战乱之频,民族矛盾之烈,百姓的惊恐心理由此可见一斑。据说烽火台也有第二个用途,每逢节日四个烽火台用绳相连,挂满彩旗,气氛热烈,烽火台



真成了战争与和平的纪念碑。

藏区新旧民居区别很大,令人一目了然,这为我收集素材提供了便利。新民居已越变越矮而宽,牲畜已迁出屋,于是院内设备变得丰富起来,最显著的变化莫过于那宽达十米的阳台了,那里成为和平生活气息的集中体现。一个正在窗框上描绘五彩图案的藏民对我给他房子照相高兴至极,把全家叫到了阳台。是的,这确实值得炫耀,安定、和平对于饱尝战乱之苦的人民来说是太珍贵了。

## 三

有些事物普及得真叫迅速。走在偏僻的小镇,如果你看见背书包的孩子蜂拥在大木窗前,走近些就会听见阵阵电子游戏机的怪叫,那宽大的木檐在滴着水,底下挂着硬纸牌,上面歪扭地写着“新到‘魂斗罗’”。在还未通车的毛儿盖乡,我惊讶地发现,在仅长几十米的街道两侧,竟放了三台露天台球桌。

碾磨藏族乡坐落在夹金山口。我走进一户好客的藏民家中,想收集灶台的素材,抱着孩子的大嫂笑笑说:“这已好几年不用了。”我惊奇地问:“那靠什么做饭呢?”她答道:“电饭锅。”适应了堂屋的黑暗,我环顾四周,除做饭的电器外,角落里还放着一台洗衣机。我知道在楼上卧房一定有台电视机,因为我刚才画外景时已发现了房顶的电视天线。川西北水力资源极丰富,这些年湍急的河流上普遍修建了小水电站,电力相当充裕。我住的招待所大都备有1500瓦的电炉,供旅客自己烧水取暖,这若在国内其他地区肯定是禁止的。不过,这里的基层干部似乎还没很好利用这种优势去发展生产以创造经济效益。看来改革之风在经济意识和文化素质方面的深入还有个漫长的路程。

说起电视,它在这些闭塞地区的普及,虽然刚起步,却是最令人欣慰的事。它的影响已超过任何文化形式。一个不相识的藏民认定我是记者,拉住我的手,让我一定转告电视台多播点藏民的生活。

## 四

对我来说,此行最大的收获是徒步翻越大雪山——夹金山。

夹金山海拔4600米,横亘于宝兴县与小金县之间,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有民谣“夹金山,鸟儿飞不过,人不攀,除非神仙到人间”,于是又称为“神仙山”。红军在川西北共翻越8座大雪山,过夹金山最为艰难。这是因为夹金山气候恶劣,变化无常,冰雹、暴风雪骤然袭击。身穿单衣穿着草鞋、积劳受饿的红军战士在这里经受了相当严峻的考验。



《壮丽史诗·长征画传三部曲》插图 沈尧伊作

山,过夹金山最为艰难。这是因为夹金山气候恶劣,变化无常,冰雹、暴风雪骤然袭击。身穿单衣穿着草鞋、积劳受饿的红军战士在这里经受了相当严峻的考验。

碾磨乡乡长给我派了一名向导,藏族,退伍军人、民兵队长,名叫雷长云。他二话不说,背起我的背包,抬腿就带我上了路。当我们在密林间泉水边第一次休息时,老雷介绍当地群众给上山之路起的名:我们坐的地方为第一站“头道水沟”,出了杉林是“小鹰盘”,进入灌木丛叫“大鹰盘”,“烧鸡窝”有两间倒塌的石房,那是早年行人住宿的地方,再往前走还有“双石头”“一支箭”“五道拐”,那是一片草场,名字已形象说明了地形。从一处叫“鸡翅膀”的地方起就进入了雪线,向上为雪路,称“九坳十三坡”,顶峰名“王母寨”,因有一

座行人祈求王母保佑平安的小石头庙而得名。从碾磨乡到普生岗为30里,从普生岗到顶峰也是30里,从顶峰到达维乡60里,全程共120里。

向导说我运气好,赶上好天气。4月份,转暖时节,又没到雨季,连咬人的旱蚂蚱也不多见。要是再早再晚都难以过山。尽管如此,此行之艰难对我来说是空前的。在缺氧的情况下登山,一步一步,休息次数越向上越频繁。登上顶峰用了整整8小时。我边走边想,当年有的红军战士还过了三次夹金山,这真不敢想象,要是我非掉队不可,也许是因为他们年轻吧。不过,我马上想起了徐老(徐特立),他长征时已57岁,整整大我十岁呢!

过了顶峰,谁知又面临更大的考验。下山处背阴,雪深及腰,小路用石堆为标记,否则白茫茫

根本无路可寻。我想学红军滑下去,老雷忙制止,因为偏离路标,就可能掉进雪窝而丧命。走雪地可太费劲了,简直是在挪。在挣扎,好不容易下到雪线,不承膝以上还是雪,以下竟成了冰水,几次摔跤,汗水冰水里外湿,脚也完全冻麻木了。我喘着大气想:体验到了这层,算是没白来。

沿着冰水汇成的小溪,我们直下山谷。我不时落在后面照相。我敢说,夹金山景色之美绝不亚于任何风景名胜。皑皑雪原,滔滔山泉,杉林傲立,灌木连团,高山湖清如镜,峡谷色艳若虹。据说夹金山如其名,真的产过砂金,不过我看夹金山真正之美在于它的美,自然之美和长征精神之美。

我们晚9点才登上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的达维桥。躺在床上,我竟然因为累过了头,夜不成寐。眼前闪烁的仍是脚下的积雪和卵石,耳边又响起老雷的话:爬山不能慌,不要急,一步一步踩稳了才行。这朴素的语言中包含了多少人生的哲理!

## 五

藏式木楼的阳台特别长,我伏在木栏杆上,被两河口的黄昏所陶醉。两河口是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旧址,梦笔河和虹桥河两河交汇、转弯,在暮色中闪光,余晖中的雪山灿烂如同黑暗中的火把。一个打草归来的小姑娘在楼下仰着头告诉我:“那里叫‘天鹅抱蛋’!”“为什么呢?”“老人都这么说。”我不禁笑起来,这话可真朴素,不过确实很形象。

甘南小镇哈达铺是我此行的最后一站。我鞋上带了厚厚的黄泥,登上了驶向岷县的长途汽车,上车的瞬间,我突然感到一种依依不舍的心情。送我上车的红军纪念馆的老韩,我刚刚认识半天。他拖着不太利索的腿,在泥泞中领着我参观红军在哈达铺老街的旧址,还不断解释着他的设想和规划。哈达铺在保护长征遗址方面的工作可以说是较好的,我为老韩的热情感动。我知道,这类纯属精神文明建设、毫无经济效益的工作,在如今是举步维艰的。老韩说:“我本来可以退休,但我仍在干,那完全是凭着感情。”

毛儿盖河从大草地顺沟而下,袅袅炊烟处,母亲们正在草滩上用最古老的工具编织羊毛毯。灌木丛中的空地,男女青年正围成圈跳藏族舞,那是在为即将举行的草原运动会准备节目。远方,一个小伙子骑马踏上山岗,随风飘来了悠扬的山歌……我感到心中充满了清新的气息,似乎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这种熏陶,这种感受,虽然无形,但我确实认为比背包里那25卷胶卷和两大本速写更为可贵。

## ■创作谈

# 为了不能遗忘的昨天

□古尔图

我慢慢走进塔城的历史,真正认识到这一片地域的昨天。

我先后走访了几十位老人,听他们讲述了自己和祖上的故事。在了解塔城的整个历史脉络之后,我受到了强烈的震撼。我知道和我一样,很多塔城人并不了解塔城的这些历史,而我在创作这部小说的时候,有必要用故事的形式来讲清楚。

巴克图口岸贸易的繁荣,一共有四次。第一次是清朝末年,1850年以后,清朝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俄商在塔城不纳税,短短几年时间,塔城洋行林立。第二次是1921年以后。1920年,苏俄红军按照与杨增新的约定,从巴克图入境剿灭白俄卫队万余人后撤走,巴克图才迎来平等的经商环境,中国商人逐渐崛起。第三次是20世纪90年代,随着巴克图口岸的开放,大浪淘沙,以发展壮大的三宝公司、西部实业等公司为代表的中国外向型企业崛起。第四次是2020年12月,国务院批复设立新疆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这也是西北地区首个沿边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从

此,巴克图口岸再次承载着特殊的光荣与梦想。

之所以选取巴克图口岸的第二次繁荣为背景,创作这部小说,是因为其具有历史的厚重感和沧桑感。1919年7月,苏俄外交官加拉罕发表了第一次对华宣言,帝俄在塔城方面的一切特权被取消,小说就从这里切入。这本来是一件天大的好事,是实现平等贸易的机会,但事与愿违。苏俄向塔城巴哈台派了新的驻塔城领事,但旧沙俄领事不承认苏俄新政府,困兽犹斗。塔城道尹是前清的遗留官员,碌碌无为,致使新领事在巴克图被刺杀。紧接着大批白俄败兵聚集边境,对塔城造成了严重威胁。白俄败兵想把塔城建成反苏俄的基地,最后塔城人民配合苏联红军,将其剿灭……

巴克图是两国交界,各种势力在此角逐。在塔城纷乱复杂的历史中,其环境的每一次变化都跟国际形势密切相关,选择从苏联红军入境剿灭溃败白军切入,就是要小说从一开始就进入矛盾白热化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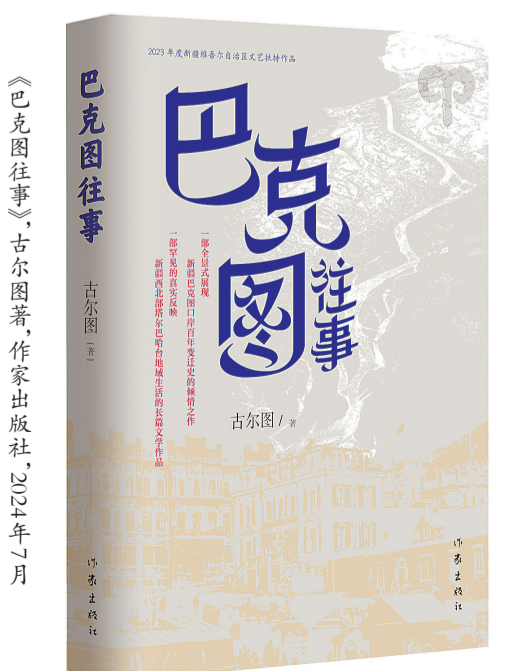
小说故事发生的时间段为1919年至1951年,共30余年。为了把小说写得像史诗,配得上塔城跌宕起伏的近代历史,我在无数个深夜里听那首马克思西姆的《出埃及记》,寻找塔城巴哈台地区各族人民的宏大气势和悲壮的历史感,以创作出一部结构宏大、人物鲜活的长篇历史小说。我试着将传统的小说创作手法和现代的影视表现手法相结合,增强小说的可读性。起笔初期,我的内心波澜起伏。我走在塔城的大街上,搜寻着这座城市的历史遗迹。晚清以来,塔城作为边境小城,经历了那么多屈辱。从十月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30余年间,经历了五次兵临城下,在那人命贱如纸的年代,到处都是鲜血和死尸……无数的先民,他们用鲜血和生命启发了我的文字。谢谢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各族人民!

我有一个愿望,希望《巴克图往事》是一本能立在新疆大地上的小说,希望小说中的那些人物,能长久活在读者的心中。

《巴克图往事》是2021年5月新疆塔城地委决定实施的三项文艺创作工程之一,是塔城地区打造的一张文化名片。我被选中承担历史小说《巴克图往事》的创作任务,有惊喜也有意外,接受任务之后,深藏于心底的家国情怀被彻底点燃。

巴克图是两国交界的一个通道,也是一个奇特的口岸。她与身后的塔城市只相距12公里,这样近的距离,使得她几乎和塔城唇齿相依,浑然一体。在巴克图口岸通商的200多年历史里,口岸兴盛,则塔城繁荣;口岸冷清,则塔城闭塞。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塔城变成了南北疆各地的俄国商品转运站。巴克图口岸的冷落与繁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甚至影响着整个新疆。让人难堪的是,巴克图口岸曾经的贸易繁荣,并不是她的荣耀,而恰恰是她的屈辱。巴克图口岸本就是不平等条约催生的一枚苦果,她的诞生是一段痛苦的经历。起初塔城人也不是气定神闲地开门揖客,而是在强邻的刺刀逼迫下,在一种苦涩的无奈中,极不情愿地敞开了瘦骨嶙峋的胸膛。

回顾过往,巴克图曾给塔城带来过困惑,带来过屈辱,也带来了觉醒。那一束用15只羊才能换来的手电筒的微弱亮光,也唤醒过国人的自强。十月革命的消息从这里传进来,共产主义理论从这里传进来,一批批留苏学生从这里走出去,还有一些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也从这里往返苏联与延安……



为深入了解自己生活的地域,我认真翻阅了大量的塔城史料,并拓展到相关史料。比如柳青人在新疆的经商活动,资料最为详细的《关于柳青商人在新疆的活动》,居然是日本人奥村荣、山本斌于1936年所著。通过那些历史资料,